

蔡永良 著

美国的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



上海三联书店

蔡永良 著

美国的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的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蔡永良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7. 7

ISBN 978 - 7 - 5426 - 2589 - 2

I. 美… II. 蔡… III. 语言教学—研究—美国
IV. 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8442 号

美国的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

著 者 / 蔡永良

责任编辑 / 姚望星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11

ISBN 978 - 7 - 5426 - 2589 - 2/G · 850

定价: 28.00 元

序

蔡永良教授发来《美国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一书书稿征求意见,自知于书稿所涉领域相当生疏,与门外汉无异,本当婉拒,然考虑毕竟是一次学习机会,也就随口应承了下来。不料拜读一遍交差之时,蔡教授竟又“得寸进尺”,要我为书稿作序,理由是出版期限紧迫,另请他人已无可能。这就让我十分为难了,同意吧,显然非合适人选,推辞吧,人家计划中的“序”就很可能因我而泡汤。权衡之下,还是我作出让步,答应以一名普通英语教师的身份写上几句读后感权充序言。由这件事我也得到了教训,自己不擅长的事可不能随便答应,否则就难免陷于被动。

作为一名英语教师,平时熟悉的是实践层面的语言教学的概念,对于理论层面的语言教育以及语言政策等概念则比较陌生。感谢蔡永良教授把我引领到了对我来说几乎是全新的一个领域。通读全书,蒙蒙胧胧得出以下几点认识,不揣浅陋,写下来和读者交流,并就教于方家。

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文化的载体,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的语言代表了对该民族的文化的认同,集中体现该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民族精神。这也就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洪堡特的观点: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这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语言消失了,该民族的文化也就失去了认同,失去了赖以传承的载体,最终也就和语言一起消失了;而一个民族一旦失去了文化,也就失去了生命的基

因,失去了灵魂,作为一个民族也就不复存在了。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正是有了汉语言文字这一联系纽带以及对汉文化的认同的源泉,中华民族才得以生生不息,繁衍至今达五千年之久,使中华文明成为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本书所叙述的美国印第安人的不少部落却在美国软硬兼施的惟英语运动或英语官方化运动中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被迫接受全面的同化教育,以“改造成美国社会能够接受的文明人”;而随着一种种印第安语的消失,一个个印第安人的部落作为文化实体也就永远地消失了。

由此我也想到,既然语言于文化是如此重要,彼此关系是如此密切,为了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为了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有百条理由像珍爱自己的眼睛一样珍爱自己的母语(也包括尊重爱护少数民族的语言),而无任何借口可以忽视母语学习甚至糟蹋滥用自己的母语。改革开放以来,出于国际交流的需要,国人学习英语的热情不断高涨,英语水平不断提高,这是好事。但与此同时,年轻人的汉语水平却呈现明显下滑的趋势。令人欣慰的是,这一现象已引起高层以及全社会的严重关注。最近,教育部要求高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便是这种关注的具体体现。此外,针对各地语言文字使用中出现的种种混乱和不规范的状况,国家以及地方语委也根据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管理办法对各地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经常进行督促和检查,对规范语言文字的使用起到了积极作用。真诚希望国人能够把对母语的重视提高到关乎民族兴衰的高度来认识,不但自己要以实际行动来体现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还要教育自己的后代也永远珍爱祖国的语言文字。

我进而想到,作为英语教师,教好英语固然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但既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我们一方面要在教授英语语言的过程中注意结合英语国家的文化,防止把语言和文化割裂开来,另一方面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英语在本质上代表着英美国家的文化以及价值认同,从而避免在教学中不加鉴别地向自己的

学生灌输西方文化,造成学生崇洋媚外的不健康心态。美国印第安人各部落以及众多移居美国的少数民族族裔在美国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的主宰下,在以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为核心的文化侵略和强大征服面前,尚且激烈地进行抗争,努力维护和保持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而我们在自己母语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英语教学,却以学习地道英语的名义,自觉不自觉地为西方文化摇旗呐喊,不加批判地宣扬西方的价值观,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充当西方文化的义务教员,那岂非莫大的悲哀?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最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随着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化”正作为一个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以各种形式进入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之中,而英语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正起着最主要的国际通用语的作用。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新形势下,全球文化是走向一元化还是多元化?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十分赞同本书作者的观点,即“文化多元是客观存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特征和基础。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是促进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前提。相反,以一种文化压制和打击其他文化的文化霸权主义不仅有悖民主和人权的基本理念,而且对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整个文化的发展和繁衍有害。这一点在世界逐步走向‘全球化’,少数几种语言,特别是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的当今,更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课题”。具体来说,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一方面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抵制西方中心主义,保持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一方面又要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虚心向先进文化学习,在和异族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取长补短,共同参与人类文明的建设。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丛林法则”(the Law of the Jungle),亦即“弱肉强食法则”在很长的时期内占着主宰的地位,这是必然的。不可否认,与历史的各个阶段相比,今日的人类文明已经取得

了巨大的进步。但就总体而言,似乎“丛林法则”仍然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假如说伊拉克战争向我们展示了强权政治是多么残酷和血腥的话,那么本书所描述的美国的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则告诉我们,没有硝烟的战争同样可以吞噬和毁灭一个民族。我们相信,人类及其所创造的文明总是不断进步的。“丛林法则”毕竟是动物界的法则;随着人类身上低级的动物性的不断减少,随着人类素质的不断提高,这一法则最终要被中华文化所主张的“和谐共存”的原则所替代。其实,西方文明也主张“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只可惜这一主张常常被一些主张强权政治的政客们丢在脑后。

王菊泉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日于上海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绪论	1
一、语言教学与语言教育	1
二、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	9
三、历史背景和研究基础	19
四、资料说明与本文结构	39
第二章 新大陆的语言拓殖	41
一、旧世界的传统	41
二、新大陆的际遇	59
三、构建“巴别塔”	72
四、殖民地的语言教育	81
第三章 建国时期的语言统一	93
一、确立英语地位	93
二、语言标准化	102
三、同化德意志语言	112
第四章 十九世纪的语言教育	121
一、西进运动:天定命运	121

二、教育者与受教育者	137
三、毁灭文明的语言教育	157
第五章 二十世纪的双语教育	182
一、从惟英语教育至双语教育的演变	183
二、《双语教育法》	200
三、西裔移民的语言教育	215
第六章 世纪之交的英语官方化运动	237
一、运动由来	237
二、英语官方地位立法	245
三、废除《双语教育法》	261
四、本质特征	282
第七章 结语	289
一、美国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的本质特征	289
二、美国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的研究启迪	297
参考文献	303
人物、地点、机构、文件、术语等汉英对照及索引	326
后记	345

第一章 绪 论

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为撰写博士论文《语言·教育·同化——美国印第安语言政策研究》的需要,比较广泛地接触了美国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的材料,发现其中许多历史事实蕴含丰富的内容和深远的意义,如果能对此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能使我们对美国的语言政策及其语言教育的本质特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且还能使我们对一般意义的语言教育和语言政策乃至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由此萌发了研究这一课题的想法。

作为绪论,本章计划通过说明语言教学与语言教育的异同、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的关系、美国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的历史背景以及前人研究的状况,勾勒出本文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基础。

一、语言教学与语言教育

人们通常对语言教学比较熟悉,而且比较容易将语言教学与语言教育混为一谈。^①从理论上讲,语言教育与语言教学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要深入讨论语言教育,有必要把它同语言教学这一概念加以区分。

① 付克(1986):《中国外语教育史》(*A History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李良佑、刘犁(编)(1988):《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刘润清、吴一安等(2000):《中国英语教育研究》(*Studies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刘润清(2004):《英语教育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语言教学是指施教者通过各种手段、方法、措施、设备等使受教育者学会某种语言的过程。语言教学强调的是一个教师施教、学生习得的技术过程。由于人们是在不知不觉中习得母语的,在一个人只会一种语言(即他的母语)的情况下,对语言教学是陌生的。比如,我国中小学都开设语文课程,但是,学习者对于语言教学这一概念却不是十分强烈的,很少有人会自觉地意识到我是在学习一门语言。即使是教师,他们一般也不会认为他们是在教一门语言,而只会说是在教语文,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教学对象对语言的习得已经在入学之前就完成了。事实上,语言教学这一概念是同外语学习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我们讨论外语教学的时候,语言教学这一概念才显得十分清晰和强烈。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从事外语教学的教师会经常碰到或使用这一术语。许多研究语言教学的学者专家给语言教学下定义的时候,大多考虑的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因为很多人认为母语习得并不需要语言教学就可以完成。如研究第二语言教学问题的权威人士、加拿大卓越的教学法专家 H. H. 斯特恩(H. H. Stern)在他《语言教学的基本概念》(*Fundamental Concepts of Language Teaching*)一书的开首就明确区分了母语、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外语以及语言教学、语言学习之间的关系,将讨论的重心放在非母语语言教学上面。^①

从基本内涵看,语言教学关注的是语言教学法,它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母语习得和二语或外语学习的异同、外语学习的听、说、读、写、译能力的培养、语言错误分析、语言测试、多媒体教学等,有时也会涉及二语或外语学习的心理和社会文化特征。但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如何更有效地提高语言教学的效益。

近些年来,由于现代语言学的深入发展,语言教学理论与实践也有了一个比较长足的进步,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冠名为“应用语言学”。顾名思义,语言教学研究是语言学理论的实际应用,因此语

① Stern, H. H. (1983).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9-21.

言教学的理论框架是语言学。现代语言学自索绪尔开创发展至今,语言本身的研究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受之影响,语言学理论在语言教学领域的应用也就基本局限于语言本身,具体来说,主要局限于言教学的技术或技巧性研究,对于其他方面则很少关注。

我国外语教学界十分熟悉的英国著名语言教学理论家 H. G. 威多森(H. G. Widdowson)认为,语言教学是在“教学原则指导下解决问题的职业活动”,“教学的成功在于理论的正确指导,在于教师采用与理论相适应的教学手段,并根据特定学生群体具体情况发挥个人的创造性;教学的过程既是传授知识的过程,又是对教学理论的实践过程和教师提高讲授能力的过程”。^① 显而易见,语言教学一方面是一个提高学习语言效率的活动过程,另一方面是研究探讨如何提高教学效果的理论探索过程,这一点在《语言教学的流派》(*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②一书中也谈得很清楚。

语言教学的研究对象之一是语言,主要是外语。在语言教学领域里,语言被看作是工具,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这是语言最普通的定义。当我们打开关于语言教学的著述时,几乎每一本都会这样说。^③

① Widdowson, H. G. (1979). *Exploration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3; (1990). *Aspects of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6.

② Richards, Jack C. and Rodgers, Theodore S. (1986).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③ Widdowson, H. G. (1978). *Teaching Language as Communic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rumfit, C. J. & Johnson, K. (1979) (Eds.).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ern, H. H. (1983).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Issues and Options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ok, Guy and Seidlhofer (1995). *Principles & Practice in Applied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r, Penny (1996). *A Course in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 and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ok, Guy and Seidlhofer, Barbara (1995). *Principles & Practice in Applied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顺理成章,语言教学最大的宗旨就是教会受教育者如何最有效地使用这一工具。如果语言确实仅仅是人们交际的工具而已,语言教学仅仅涉及教学过程中的技巧和技术问题,那么我们把如何使语言教学达到最佳效果视为语言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最高原则是无可非议的。在下文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不然。

总而言之,语言教学无论是定义还是内容,无论是历史还是现状,均体现了集中于教学法这一较为狭隘的范围内的基本特征。

语言教育则不然,它所涵盖的方面要广得多,其内涵与外延与语言教学都有很大的差异。

首先,在对语言的定义上,它就有别于语言教学。在语言教育研究领域里,语言不仅被看作是交流的工具,也不仅是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更重要的是,语言被看成是对某种文化的认同,是某一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和生机。如当代著名的芬兰语言学家托芙·斯古特纳伯—康格斯(Tove Skutnabb-Kangas)十分关注语言教育问题,她把语言教育与语言生存之间的关系看作是“谋杀”关系,因此她的语言观是:语言是一种纽带,我们的母语既是我们认同的标志,又是形成我们认同的源泉。语言在人类生活的大多数领域里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① 她认为,语言是一种工具,但是这一工具并非语言教学话语中的交际工具,而是人类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改革世界、创造世界的工具,^②因为人们是通过语言来感知万物、构建概念、组合思想的。^③ 语言中的词汇就像人们脑海里的一系列挂衣钩子,把他们所习得、继

① Skutnabb-Kangas, Tove (2000). *Linguistic Genocide in Education — Or Worldwide Diversity and Human Rights?*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pp. 104 - 105.

② 同上,第 105 页。

③ Sapir, Edward (1929). The Status of Linguistics as a Science. *Language* 5, (1929), pp. 207 - 214; Whorf, Benjamin Lee (1956), in Carroll, J. B. (Eds.) *Language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 New York: The MIT Press and John Wiley.

承、创造、接受到的理念和思想挂在上面,储存在大脑里面。它们是整合那些理念和思想,赋予它们整体意义的架构。语言帮助人们反映、记忆、再造意义,从而使他们能够把握存在的意义,并参与、改变、创造存在。^① 离开语言,这一切是不可想象的。上述论述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观点:语言与人们的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语言是人们用来认识世界、表达世界、创造世界不可或缺的途径。这是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更加全面阐述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的理论是语言相对论。这一理论的先驱海曼(Johann Georg Hammann)指出:理智不是与生俱来的先天产物,而是在语言指引下的一个能动的联想过程。另一位理论家赫伯特(Frank Herbert)说,语言是人类思想的工具、内容和形式。语言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经历和解读世界以及不断积累主观意识的历史。因此,每一个民族怎么思考就怎么说话,怎么说话就怎么思考。^② 德国著名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William Von Humboldt)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组织器官;智力活动完全是大脑内部无影无踪的活动,思想通过人们说话的声音得到外显,使人感知。因此,尽管我们可以人为地把思想和语言分开,它们其实是一个整体。“当我们了解其中之一的特质时,我们也就了解了其中之二的特质。”^③

① Skutnabb-Kangas, Tove (2000). *Linguistic Genocide in Education — Or Worldwide Diversity and Human Rights?*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p. 105.

② Janney, R. W. & H. Arndt (1993). Universality and Relativity in Cross-Cultural Politeness Research: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ultilingua* 12-1 (1993) pp. 29-31.

③ Humboldt, William, Von (1988). *On Language: The Diversity of Human Language Structur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Mental Development of Mank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54; Gumperz, J. J. and S. Levinson (1991). Rethinking Linguistic Relativity, *Current Anthropology*, 32-5 (1991) pp. 613-623; (1996), (Eds.), *Rethinking Linguistic Relativ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1.

语言相对论不仅从理论高度论说了语言的本质特征,而且为语言教育研究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理论依据,即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美国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和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在他们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中指出:人类不仅生活在客观世界里,也生活在主观世界里;人类的主观世界是由“语言的习惯”,或“模式规律”所构建的,这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思维、文化三者间的关系如此紧密,假如人类语言本质特征是共性的话,那么,人类的思维和文化本质上也应该具有共性,因此,以“标准语”作为教学目的语的语言教育,无可非议,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然而,语言相对论认为: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语言习惯”,或“模式规律”;客观世界是由主观世界的活动而得以感知的;因此,使用不同的语言的人对自然世界有不同的感知。^①人们由于不同的语言而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产生了差异,这一差异一方面说明了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不同语言以及文化共存的意义。

虽然语言存在某些共性的地方,^②但是它们并不代表语言最本质的特征。道理很简单,如果世界曾经拥有过的成千上万,现在仍然还有 6000 多种语言本质上是相同的话,那么人类文明不会那样绚丽多姿;人类社会也就不会那样纷呈繁杂,一切都会在呈现单调乏味的同时

① Sapir, Edward (1929). The Status of Linguistics as a Science. *Language* 5 (1929) p. 209; Whorf (1956). In Carroll, J. B. 1956 (Ed.) *Language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 New York: The MIT Press and John Wiley, p. 252; Fishman, J. A. (1960). Systematization of the Whorfian Hypothesis. *Behavioural Science*, Oct. (1960), p. 323; 蔡永良(2004):重温“语言相对论”,《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总第131期),第74页。

② Chomsky, N. (1955).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Theory*. New York: Plenum;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IT Press; (1975). *Reflection on Language*. New York: Panthenon Books. Greenberg, J. H. (1966). (Ed.). *Universals of Language*. Cambridge: MIT Press; (1978) (Ed.).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 Vol. I and III. Stanford: SU Press.

变得简单容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历史是这样,现状也是这样。这正好从反面说明语言的相对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维和文化的相对性。

语言、思维、文化的相对性,起决定作用的是语言。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告诉我们,思维、文化的相对性是由语言的相对性而派生的。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语言教育往往是教授某种“标准的语言”,与此同时,把那些“非标准语言”排斥在教育之外。宏观而言,这既是一个共时现象,又是一个历时现象,但正是人类这一悠远的历史错误和硕大的现时短见将自身最伟大的创造——语言——一个一个地送进了坟墓,与此同时,将人类文明送入走向单元化的轨道。^①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类文明是以多元为特征的。语言相对论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文化的多元特征是人类语言的多样性所决定的。因此,如果要维护人类社会文化的多元化,首先就必须维护语言的多样性。这一点将在本章第二小节中进一步展开讨论。

对语言不同的定义将语言教学与语言教育区分开来:语言教学将语言看作工具,语言教育将语言看作文化;语言教学旨在教会学习者使用语言的技能,语言教育旨在授予学习者文化。假如我们能够在实践中把语言教学和语言教育截然分开,问题会单一得多,但事实告诉我们这不可能。从实践层面上看,两者无法分开。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近年来国内有不少师范院校为了明确把一部分外语学生作为外语师资培养,纷纷把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更名为外国语言教育专业,如英语教育专业、法语教育专业、日语教育专业等。这样更名虽然既“换汤”,又“加药”,但由于课程设置中最大的一块仍然是语言教学,仍然是以训练和

① 参见:Skutnabb-Kangas, Tove (2000). *Linguistic Genocide in Education — Or Worldwide Diversity and Human Rights?*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加利(2002):多元文化与多元语言,《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8—10页。

提高学生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为主要宗旨,所以,这些所谓的外国语言教育专业与原来的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很显然,这些院校对于语言教育的概念在认识上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偏差,一般只看到语言学习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对目的语文化的深刻了解,而对语言教育对语言学习者在文化和思维方面的影响,乃至对语言、思维、文化以及社会之间的宏观关系等则不太清楚。当然,其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专业在传统的课程中加进了文化课程,从而使现在的语言教学与传统的语言教学有了一定程度的区别。

由此可以看出,语言教育包含语言教学,但是两者并不等同。

其实,更重要的区分还不在实践层面,而在理念层面。实践层面多一门或少一门课,并不涉及本质问题,这种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无论是语言教学还是语言教育,都有一个语言施教过程,关键在于教育者实施这一过程的目的是什么,关注些什么,采取什么政策或措施来实现这些关注和目的。如前所述,语言教学似乎纯粹关注语言能力的获得,而语言教育关注的不仅是语言技巧的获得,而且还包括所教语言的文化的获得。这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其实,由于语言、思维、文化三者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任何语言施教过程不可能与文化分开,因此,很显然,从事语言教学微观研究的人们努力回避了从事语言教育宏观研究的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极力保持并不存在的所谓的“科学中性”。同理,当今我国大部分热衷于外语教学的专家学者主张把文化引入语言教学,将此作为进一步提高外语教学水平的途径,努力与传统的就语言教语言的方式划清界限,旨在通过学习英美文化更有效地学习英语。虽然他们在实践上与传统的语言教学有所区别,但是他们的语言教育概念仍然没有脱离语言教学微观研究的轨道,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有效地促进语言教学”。^①

① 刘润清、吴一安等(2000):《中国英语教育研究》(*Studies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刘润清(2004):《英语教育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